

甘肃文史精萃·学术卷

刘醒初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薪火相传 共铸辉煌

中共甘肃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刘立军

如同穿越了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一路东流入海的黄河，陇原的历史和文化浩荡而来，在中国的大地上闪耀着独特而璀璨的光芒。从当初的一缕燧火，到而今的泱泱大观，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在中国大西北的热土上，更加繁荣、发展和生机勃勃。

无数前人和今人的劳动与创造，构建了陇原历史和文化的大厦。先人的文明之光依然在星空中闪烁，今人用自己的创造传承和发扬了先祖的精神和光芒，将推动陇原文明生生不息，奔腾前行。

古往今来的星辰之光，值得我们铭记，并将他们收藏于浩荡的陇原历史之河，成为我们前行的借鉴、指引和动力。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纂出版的《甘肃文史精萃》，就是收藏历史、镜鉴当代并鼓舞未来的一次可贵尝试。

文史研究馆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力量，是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联系党外文史界知名人士的重要渠道，是重视

民族文化遗产的具体体现。自 1953 年成立以来，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巩固扩大党的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大批在文史研究和艺术创作等方面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在书画、诗词歌赋、文艺创作以及陇原文史的挖掘、整理、研究等方面不懈努力，成果辉煌，为祖国传统文化和甘肃地域文化的弘扬与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甘肃文史精萃》的编纂和出版，是甘肃省文史研究馆成果的一次展示，是省文史研究馆向祖国 60 华诞奉献的一份厚礼！

涓滴之水，可以映日；毫末清风，遐迩流芳。涵盖了陇原史料、学术、掌故和风物四大门类的《甘肃文史精萃》，将带着对中华文明千年历史的深情厚谊，带着对祖国和陇原大地的真诚祝福，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走向社会，走向群众，走向甘肃更加辉煌的明天！

是为序。

2009 年 9 月 10 日

目
录

从宏观视野看古代文化遗址开发的重要意义		
——以盘古文化遗址的开发为例	柯 杨 /	001
从伏羲谈及中华文化	樊保良 樊 翔 /	010
“宋人”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域偏见	张崇琛 /	041
伏羲身世考	漆子扬 裴元璋 /	051
西王母形象的演变	陈利民 /	059
女娲神话	张崇琛 /	068
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	赵逵夫 /	075
豳国地望考	汪受宽 /	099
西汉水 “天水”的发源地	田 佐 /	110
浅论秦陇西郡与陇坻、陇坂、陇山的关系	何 钰 /	114
固原地区与丝绸之路	韩 溥 /	120

皇甫谧家世考辨	孙巧云/	130
汉魏时期武都氏人的三次大迁徙	曾 礼/	137
“草圣”张芝事迹考		
——兼论“草圣文化”的发掘与弘扬	李并成	杨发鹏/ 141
《阴平国考》	韩定山/	158
仇池国与白马人渊源关系考述	黄 英/	194
验证甘肃历史的宋代牌印	秦明智/	203
漫谈西夏	张思温/	208
黑水城的历史地位及其废弃荒漠化的新认识	陈炳应	梁松涛/ 221
西藏—祖国：凉州会谈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樊保良/	236
浅论何永达《林泉偶得》的哲学思想	赵 忠/	245
格萨尔与敦煌	王沂暖/	254
敦煌古塞城考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札记之一	李正宇/	260
敦煌曲子词浅析	曾文俊/	267
武都藏民考	焦红原/	274
赵时春生平、仕履及《赵浚谷集》两个版本的考察	杜志强/	290
论近代陇上诗人王权的诗歌创作	张 文/	303
冯国瑞先生著述考略	漆子扬/	314

从宏观视野 看古代文化遗址开发的重要意义

——以盘古文化遗址的开发为例

柯 杨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强力推动和旅游产业兴旺的影响下，尤其是近年来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利用越来越受到全社会与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全国各地对古代文化遗址的保护、宣传、开发与重建也可说是一浪高过一浪，开会研讨、办节公祭、招商引资之举时有所闻。各界人士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褒贬不一，歧见迭出。本文以盘古文化遗址的开发为例，谈谈我个人对古代文化遗址开发与重建这类新民俗现象的看法。

据我初步了解，目前全国的盘古文化遗址正在开发与重建的地方约有 20 多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河南南阳市桐柏县；河南驻马店市沁县；广西来宾市武宣县与象州；江西赣州市于都县；广东肇庆市北岭山；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广东清远市连南县；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等处。这些地方，大都以有关

的文献记载、当地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上以“盘古”命名的山岭、河流、地名、古建筑遗址以及传统的盘古庙会和祭祀仪式为支撑，进行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旅游景点的重建。其中，以桐柏县的规模为最宏大，举措最为有力。这与以马奔欣先生为代表的桐柏学者们长期以来对当地盘古神话的深层研究的丰硕成果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古代文化遗址的开发与重建，不仅仅限于盘古文化，还包括龙凤、伏羲、女娲、黄帝、炎帝、梁祝、牛女等一大批与神话传说有关的古代文化的遗存地点。对这类文化现象，有人就持否定态度。比如，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界影响颇大的《读书》杂志2007年第6期的封二，刊登了黄永厚先生的一幅画，画中是伏羲女娲交尾图，形象十分难看，画中的说明文字是“扫黄打黑轮不到二位头上了”。所配的陈四益先生的讽刺性短文《磕头》，对近年来全国各地公祭远古祖先和历史名人的活动进行了批评。两位先生都是我所尊敬的文化人，他们的绝大部分作品也是我所喜欢的。然而，这次的合作成果却是失败的。尤其是陈先生把各种公祭活动一律贬之为“磕头”，并得出这可能“把中国闹成国将不国”的结论，更是我所难以苟同的。两位先生的失误，主要在于把传统文化的复兴（包括民间祭祀活动及其相关仪式）与我国的现代化和科技的进步对立了起来，未能从深层理解振兴传统文化对恢复国民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也未弄清各类仪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和对民族情感的凝聚作用。两位先生对民间祭祀仪式的歧视与挖苦，同何柞庥院士“传统文化中90%是糟粕”的骇人言论如出一辙，其核心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传统，颇有点儿当年“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架势！须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个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的民族，就不会明白往哪里去的道理；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的民族，就会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

我认为，全国各地对古代文化遗址的开发与重建，是一种应运而生的文化现象，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将我的三点思考简述如下，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古代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乃是坚持世界文化多样性原则的具体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1 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采取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多样性体现在组成人类群体和社会特征的独特性和多元性。作为一种交流、创新和创造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应当为当今和未来世代的人类的利益而予以承认和肯定。”该宣言还说：“文化多样性也是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这些话，高屋建瓴地说明了文化的多样性对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生物的多 样性对环境保护的重大作用早已受到国内外的普遍重视，那么，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在我国还远远没有被多数人认识，古建筑的随意被拆毁、民间手工技艺的大量失传、民间口头文学的萎缩与消亡，作为人们精神支柱之一的民间传统信仰活动的被排斥和受打击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正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霸权主义到处插足，无孔不入的形势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空前威胁，所以各个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奋起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遗产，形成了文化反弹的世界性潮流。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2004 年 10 月访问越南时，在河内公开指责美国“在全世界扩散一种毫无特色的文化垃圾”。他指出：

如果不遏制这种粗制滥造的文化的势头，就会使各国原有的社会习俗和原汁原味的文化荡然无存。“如果只有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将会出现真正的（文化）生态灾难。”英国利物浦约翰·穆尔斯大学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伊恩·罗尔斯说 “从文化侵略和扩张的角度看，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力量。最突出的领域是好莱坞、流行音乐甚至文学。”他认为，“如果希腊人只知道迪斯尼而不知柏拉图；英国人只知道好莱坞而不知莎士比亚；中国人只知道NBA而不知孔夫子，那将是莫大的悲哀。”所以说，我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据许嘉璐先生统计，截止2007年9月，已建立了175所，其主要任务有二：一是教授汉语语文课程；二是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学术界大量建立与我国文化主权有关的各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艺术与民间技艺走出国门进行展演等等，不但是国人文化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促进中华文化崛起，保护与重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实际行动。

二、对古代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长期以来漠视甚至破坏传统文化的错误意识与行为的强力纠正

我每逢听到“我国一贯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这句话，就产生反感。因为这是一句假话，与事实真相相距甚远，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与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尽管在当时发挥了打破沉闷政治空气的作用，却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此，国人始终未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澄清和梳理。再加上我国较长一段时间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极左思潮的泛滥，到“文革”时期便走向了极端。当年“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口号的提出和许多过激行为，不但使我国的古代文

化遗产遭到空前损失，还导致我国两三代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有的人明明干了破坏传统文化的错事，竟被说成是“革命行动”，令人哭笑不得。近年来，由于国务院有关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文件得到了贯彻执行，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很高，措施也比较得力，这方面的确有了明显的转变，但还不能说已得到了彻底的纠正。比如说，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信仰活动（包括祭祀、庙会、求神拜佛、烧香、磕头、算命、看风水等），本质上是民众的情感寄托和求得心理平衡的种种俗信，却被一些人咬定是“封建迷信”活动，必欲取缔而后快。“封建”是一种历史上的政治制度，“迷信”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这两个概念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却硬被捆绑在一起，成为否定民间信仰的说辞。什么是“迷信”？真正的迷信乃是对蛊惑人心的谬论的信仰，如我国曾出现过的一贯道、法轮功，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美国的大卫教，乌干达的“恢复上帝十戒运动”等等，都是不折不扣的迷信组织——邪教。至于长期流传在我国的各种民间信仰活动，乃是一种传统的俗信，是民众情感的载体。它们不但不蛊惑人心，反而是对有困惑、有疑难、有不幸、有痛苦的人们心灵的一种慰藉。我始终认为，整个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至今仍十分有限。从人类发展历史长河的角度来审视人类思维与智力的发展，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洞察世间一切事物的宏观与微观能力，也受制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早期性和局限性。正因为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精神、情感、心理方面的大量困惑与需求是当前的知识水平和科技水平难以完全解决的，民间俗信才有它存在的必然性。而社会上大量出现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频频发生等等，则更加导致了人们对命运的相信。再加上人们对未来的强烈预知欲望和面对两难选择时的许多迷惘和不确定性，这就使民间俗信

活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持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许多俗信及其相关仪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取得心理平衡和情感宣泄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也往往能转化为生活下去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正是在这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17日在巴黎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才明确把“具有神秘色彩的、精神的、预言式的、宏观宇宙的和宗教方面的信仰和实践”纳入了必须保护的范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心编写出版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也强调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对于民间信仰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因为民间信仰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它是从采集、渔猎、游牧或农耕文明社会传袭下来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一定的合理内核，在文化发展中也发挥了特定的历史作用。”这本普查手册中还深刻阐明“民间信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科学达不到的地方，就有民间信仰发生影响的空间。即使科学发达的今天，宇宙间也有大量人类未知或至今无法认识、无法解释的领域。民间信仰将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均见该“手册”2007年1月修订版第99页）所以说，动不动就给民间俗信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把烧香磕头、祭拜祈福一律斥之为“愚昧”的人，其实正是对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意义与功能毫无所知的“愚昧学者”！在我看来，民间传统文化遗址的保护与重建，乃是国人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得到空前改善与提高的基础上的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建设，这不但是文化自觉意识有了提高的表现，也是恢复历史文化记忆和清算极“左”思潮余毒的重要举措。

三、古代文化遗址的开发与重建，也需要创意和创新

我在前面提到，全国进行盘古文化遗址开发的地方大约有20多

处，而伏羲、女娲文化遗址的开发更是多达 36 处。各地都以古文献和地方志中的记载以及当地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为依据来进行保护和开发。尽管古文献记载有历史年代的先后之差，当地民间神话传说有或多或少之异，各地遗址有规模大小之别，但保护与开发的宗旨与心态是一致的，这就是：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对远古祖先的崇敬之心进行慎终追远的纪念或祭祀活动；通过强化乡土观念和地域意识来凝聚群体的归属感；作为最具地方特色的人文旅游产品，加以推销，以求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爱国主义情操的培育、民族归属感的认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都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然而，这类文化产业的竞争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诸如文化底蕴的厚薄，设计规划品位的高低，策划投资能力的强弱，交通与接待条件的优劣等主客观因素，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鉴于神话传说人物及其事迹这类文化资源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和多中心现象在各民族、各地区的长期存在，我认为不应当把精力消耗在“争源头”、“争老大”、“争第一”、“争归属”这类“名分”争夺的论辩中，而应当在“既要守护传统，又要与时俱进”方面狠下功夫。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把深层次地挖掘这类传统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作为重点来思考，并使其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寓教于乐的活动。我们大家都明显地感觉到，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信息产业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外交、科技、商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相互交融的程度，并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民不但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对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孕着的丰富内涵，也要求有一种新的解读视角和接受方式。科学而严肃的古代文化资源开发，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也需要创意，创造

与创新。如果把“原汁原味地保护文化遗产”这一原则完全贯彻到开发活动中，就等于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开发”这个词，不但有原先被埋没、忽视，现在则应予以恢复重建的意思，而且有“变革”、“创新”的含义，而变革、创新的核心，就是满足当代人群对优秀传统文化多样化的需求和对其中包孕着的民族精神的当代阐释。欲变革传统，必先深知传统。我这里所说的“深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不要把传统文化看成凝固、僵化之物，而应当将它看成是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历史长河里的一个过程，它永远处于更新、创造之中。正如德国阐释学家加达默尔所说“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见《真理与方法》）这就是说，不论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意义和作用，都在每一代人所创造出的新成果的影响下不断地被分解着、组合着、改变着、重构着。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与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解才不至于局限于表层或形式。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应当有新的、更深的理解。我们过去一谈到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只是简单化地将它们分为“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两大类，并且认为这两者之间是界限分明的，固定不变的。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两重性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人们认知的深化而变化的。精华也罢，糟粕也罢，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简单，那样容易区分，它们将随着时代的进步与人们认识的提高，一一接受新的检验和重新评价。而这种检验和评价，将贯穿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全过程，任何企图一劳永逸的标准划分都是徒劳的。我想，只有深知传统文化精髓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并通过创造性思维和科学、合理地

操作，使古代文化遗址的开发尽量向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价值取向和认同感靠拢，并努力使它在国民道德情操的培育和文明行为自觉形成方面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促进作用，那就达到了最佳境界。衷心希望桐柏县在已经取得突出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深谋远虑，精益求精，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的样板与模范！

（《甘肃文史》2008年第2期）

从伏羲谈及中华文化

樊保良 樊 翔

如何看待伏羲？我们认为先要端正态度和研究方法。伏羲是神话人物，不是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不能与历史画等号。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有其父有其母，有生卒年月和籍贯等等，而神话人物则无，即使有，也是远古先民以原始思维的幻想方式创作出来的，且在久远的传说过程中，不断添枝加叶、润色修改过的。因此，今天我们对神话人物既不可丑化，也不可按文艺舞台上的时髦话，人为地予以“包装”。研究者指出“神话是观念的产物，观念是现实的反映，神话不是历史，但它折射历史”^①。神话属于精神文化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至某一阶段的产物，是历史形成的。它既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情况，也反映了远古先民们对自然现象和现实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说，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伏羲及伏羲文化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古代神话人物，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行认真的深入的研究。神话就是神话，切不可“荒诞”、“迷信”视之，也不可以随意引伸，乱扣“帽子”。

一、伏羲是一位中国古代伟大的神话人物

1. 有关伏羲的主要文献记载:

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里，一开头就是《五帝本纪》，将黄帝等五个神话传说人物，写成了历史人物。虽然，在写作时已经删去了一些“不雅训”，即明显的荒诞部分，但仍然保留着许多神话的色彩，还保留着许多神。司马迁著《五帝本纪》，而不言三皇，大概是由于三皇的事迹更“不雅训”的原故吧^②！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皇霸篇》云：“伏羲始作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

《周易·系辞下》称：“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为网罟，以田以猎。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祈，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又载：“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其母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

《列子·皇帝篇》载：“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

《山海经》载：“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

《管子》载：“戏造六，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

《春秋内经》载：“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人未有室宅，未有水火之合，于是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始作八卦，定天地之位，

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消息祸福，以制吉凶。”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杜预注‘太皞’，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 ”

东汉王延寿《昭明文选·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麟身，女娲蛇躯。”

《太平御览》卷78引《帝系谱》云：“伏羲人头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时生。”

北宋刘恕《资治通鉴外记》说：“太昊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端，因而名官始以龙记，号曰龙师。”

关于“三皇”人物或名次，东汉时的几位大学者班固、王符、应劭等人，说法就不相同，先后其他学者的说法也不一致。《辞海·三皇》条将其归纳为“有六种说法：（1）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2）天皇、地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纪》引《河图》、《三五历》）；（3）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篇》引《春秋纬运斗枢》）；（4）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义》）；（5）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纪》）；（6）燧人、伏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篇》引《礼纬含文嘉》）。实际都是象征性人物。最后一说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生活发展情况。”此外，《辞海》还把伏羲列入《五帝》条中，“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有三种说法：（1）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纪》）；（2）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礼记·月令》）；（3）少皞（皞）、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据近人研究，他们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

从以上尚不完全的文献资料记载中，我们已清楚看出伏羲这位